

长安历史文化丛书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

雷依群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长安历史文化丛书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

雷依群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 / 雷依群著.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长安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224-09922-5

I. ①西… II. ①雷…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西汉时代 IV. ①Z126.27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2613 号

长安历史文化丛书

西汉长安经学研究

作 者 雷依群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17.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9922-5
定 价 38.00 元

《长安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 编：耿占军

副 主 编：潘明娟 陈正奇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风军 王社教 王 晖 方光华 吕卓民

朱士光 刘 宁 李令福 李健超 张新科

侯甬坚 贾二强 贾俊侠 徐卫民 黄留珠

《长安历史文化丛书》总序

朱士光

—

当今,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开展,并开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华大地上也兴起了文化复兴与文化建设热潮,以增强国家之软实力。其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组成板块之区域性文化研究,也显现出强劲势头。在这一形势下,处于中华传统文化源头与核心地位之长安文化,显然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也更受各界之关注。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的需求,西安文理学院以富于前瞻性的眼光,适时地于2008年初建立了以副院长耿占军教授为负责人的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并于当年10月,经专家评议通过被陕西省教育厅批准确立为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之为平台,汇聚院内学术精英,并广泛联络院外知名学者,合力推进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事业持续而深入地发展。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建立后,在充分征求采纳院内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研究规划,确定长安历史地理、长安文献、长安历史与文化作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之主要研究方向。计划除定时编辑出版《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以便及时汇编推出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之论文、述评与相关讯息,促进学术交流外,还决定出版“长安历史文化丛书”,陆续分批次出版有关长安历史文化之富有新知卓见的研究性专著,以推进长安历史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样,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通过组织研究并出版《长安历史文化丛书》、《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以及《长安文献资料汇编》,三者相互配合齐头并进,必将推动长安历史文化之全方位深入发展,使长安历史文化研究,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超迈前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还达到带动西安文理学院学科建设与教学水平发展,有助于西安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发展之经世致用的预定目的。

二

前已述及，长安文化相对于组成中华文化的其他一些地域文化，处于源头与核心地位，这是历史铸就的史实，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以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文化发展也最具影响力的西周、秦（含秦国与秦王朝）、西汉、隋唐等王朝都城所在的今陕西省中部关中渭河下游平原地区（简称关中地区，也称关中盆地）为核心区域。关中盆地由于位居我国腹心地带，是我国大地原点所在地区；又处在我国国土之第二级阶梯东部^①，因而面对其东部第三级阶梯上之广大平原、丘陵地区，就处于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在地理区位上拥有先声夺人的优胜地位。加之关中盆地东临黄河，南靠秦岭，西阻陇山，北倚北山山系，四周又有函谷关（东汉末改在潼关）、武关、大散关、陇关、萧关、金锁关、临晋关等多处雄关险隘拱卫；关内渭河下游之冲积平原与黄土台塬，气候温润，地形平衍，河流纵横，草木繁茂，土壤肥沃，物产富饶，自然环境也十分优越。对此，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政治家与地缘政治学者早有论断。如公元前 337 年，秦惠文王初即位，苏秦西至秦国都城咸阳说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②后历 117 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终于凭借这一地理区位上的优势以及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功，“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③次第灭亡了东方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也就是实现了当初苏秦之“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④的

①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由西而东逐级下降，因而在地貌上也形成了由三个阶梯构成之格局。即第一级阶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第二级阶梯中部高原与盆地，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组成，海拔大都在 1000—2000 米间；第三级阶梯东部平原与丘陵山地区，平原海拔大多在 200 米以下，除长白山、武夷山、台湾山脉海拔高度超过 2000 米，台湾玉山山脉主峰玉峰海拔达到 3850 米外，其余山峰大多在 1500 米以下。

②《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③西汉·贾谊：《过秦论》。

④《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预言。公元前 202 年,西汉高祖刘邦在击败强敌项羽,天下初定,欲都雒阳之际,齐人娄敬适时进见,说之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①而刘邦在进一步听取了他信赖有加之谋臣留侯张良所言:“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②刘敬说是也。”后,作为一代明君,刘邦毅然力排左右原籍殽山以东大臣欲高祖都于雒阳之偏见,当日就起驾,入都关中。^③由此而为巩固西汉一朝 214 年帝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唐朝初年,也是由于秦王李世民力排众议,劝阻了唐高祖李渊迫于北方强敌突厥一时之咄咄攻势,欲迁都樊、邓间,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④坚持建都长安,终于成就了盛唐王朝。

关中地区,正因为具有上述地理区位、地理条件上的特点与优势,曾被唐代大诗人杜甫咏为“秦中自古帝王州”。^⑤后又于明清之际被力践“经世实用”治学思想之地理学家顾祖禹论为是“关中形胜,自古建都极选”。^⑥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形成的历史文化自必内涵丰富,积淀深厚,体大品高,影响深远。

论及长安文化的核心内容,当由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构成。这当然既因西周、秦、西汉、唐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其文治武功均对我国之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还因为这四大王朝均建都关

①《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②《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

③《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④《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

⑤杜甫:《秋兴八首》之六,《全唐诗》卷二三〇,中华书局,1960年。

⑥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三《陕西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中,特别是四个王朝主要都城周丰镐、秦咸阳与汉、唐长安城,还集中分布于关中地区中部之西安小平原上。遗迹宛然,触目皆是。

就西周、秦、西汉、唐四大王朝之文化内涵而言,虽然各有特色,但在历史上,以至迄今均发挥了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团结、教化育人培植各方英才、创新知识提升人类智慧、资政惠民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周、秦、汉、唐四大王朝文化之精髓,可作如下之概括:

周文化之精髓为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并借助分封诸侯,将周王朝“敬天保民”“重农裕民”^①之治国理念推行到各诸侯国。

秦文化之精髓为制度文化。秦王政于统一全国后,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废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又实施“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统一度量衡等政令,以强化皇帝独裁威权,巩固其统治。秦始皇创建的许多维护国家、民族统一的制度多为后世所继承,当然也有相当的变革。

西汉文化之精髓是汉武帝时获得独尊地位之儒学。尽管当时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黜,但在实际施政时,仍是“霸王道杂之^②”,即儒学与黄老刑名之学并行施用,相得益彰;并通过经董仲舒加工之儒学,调和相关学说,使之既符合西汉实施大一统政治之需要,也促使西汉统治者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仁德之治,从而使儒学得到更大的发展。

唐文化之精髓则是儒道佛兼容并包,对域外伊斯兰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海纳包容。因而造就了唐文化之灿烂辉煌,并成为世界文化之高峰。

唐之后,长安文化虽已不似周、秦、汉、唐文化那样气势磅礴,刚劲雄健,但在继承中也有发展。

长安文化,正因为其核心成分是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因而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自然处于主流地位,而在我国各地域文化中也成为源头与核心。因为我国许多地域文化,虽然其历史渊源都如长安文化一样,

①《尚书·无逸》《尚书·泰誓》。

②《汉书》卷九《元帝纪》。

远超西周之前;然而在其地域文化具体形成历程之关键阶段,大多从西周之礼乐文化中接受了至关重要的内容与影响。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河洛文化、荆楚文化等。西周初年,分封的齐太公吕尚、鲁周公姬旦、吴太伯、燕召公姬奭、晋唐叔虞、楚子熊绎均为周王室血缘勋亲或股肱重臣;及至战国时立国之赵、魏、韩氏之先祖,也曾受周王室封赏。迨至秦、西汉、唐王朝时,这些王朝的强势文化也都从关中之咸阳、长安传播到各个地域,各地域文化也都受到重大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长安文化应从中华文化源头与核心这一层级面上来认真看待,全面深入进行研究;以使人们对长安文化获得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推进我国各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

西安地区究因是周、秦、汉、唐等重要王朝与另一些政权建都之地,所以至迟自西周以来就有史官与学者文人记载这一地区之史实,如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等等,之后历代多有,积淀深厚,类型既多,数量甚巨。正因为这样,所以唐之后,历宋、金、元、明、清,各代也均有学者对古都长安或进行探访调查,或进行文献注释,或进行研究撰著。他们留下的丰硕成果,既是他们研究长安历史文化之心血结晶,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长安历史文化提供了更多的资讯。迄止民国与共和国时期,更有一批中外学者应用新的学术观点与新的研究方法对长安历史文化所涉及的问题,或撰文,或著书,或进行专题考证与研究,或进行综合性的论述,或进行理论性阐述,种类繁多,为数颇丰。

截至当前,尽管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且出现了集体性的成套的研究与撰著成果,例如2006年三秦出版社由魏全瑞主编,整理出版的有关古长安的史地文化典籍10本,名为“长安史迹丛刊”;又如,自2002年以来,西安出版社连续出版了由崔林涛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史念海、朱士光等任副主任,组织西安地区专家学者编著撰写的“古都西安丛书”28本等。然而,从已出版发行的“长安史迹丛刊”或“古都西

安丛书”之书目看,整理有关古籍丛刊之选目不够全面,而研究性丛书之选题也有缺漏;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升华性的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理论阐述的专著,除黄新亚于1989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文化史概论》上卷之《长安文化》一书,差强可列入外,尚未见有新著问世。上述情况说明当前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还有大量工作有待我们继续不断努力,予以完成。

前文虽已述及,长安历史文化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以今西安市所在之关中盆地为核心区域。其研究内容,即为这一地域范围内上起距今100万年前,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蓝田猿人时代,下迄当今之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且应以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为重心。很显然这都只是总括性之表述。然而从中也可看出其包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多样的。即从西周礼乐文化、秦之制度文化、西汉独尊之儒家文化、唐代儒道佛诸家学说竞相发展之包容性文化这一长安文化主流脉络看,其内涵就十分广博深邃。再就周、秦、汉、唐都城文化论,也包括有宫室建筑、祭祀礼制、宗教活动、学术艺术、教育伦理、科技工艺、服饰饮食、歌舞竞技等多个方面。如再加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变迁之考察论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发掘研究、民俗民风与民间文化之调研整理以及有关长安历史文化之学理上的探讨建设等,其内容就更为庞大丰厚。因而,当今我们面对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的宏大事业,必须怀抱宏大的胸襟,秉持广阔的视角,洞悉历史的进程,把握时代的走向,通过长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不断加以推进。深信凭借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进行擘画筹策与组织协调,依仗有志于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的各有关学科学者的严谨研治与悉心撰写,不断奉献出精品力作,“长安历史文化丛书”的相继出版,必将对西安市以及关中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对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以至中华文化复兴之伟业,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2009年8月5日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代序

王子今

长安作为西汉王朝的都城，当时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

《史记》和《汉书》所见区域经济与区域政治评价，六见“天府”的说法，其中五次都是指关中。如苏秦语：“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娄敬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张良语：“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如果借用“天府”一语来形容区域文化优势，其实也是适宜的。正是在西汉长安地方，经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经学的人才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此为中。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

一、长安以积极的态度迎接齐鲁文化西渐

西汉时期，是先秦时代已经成熟并分别形成深刻影响的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相互融汇的历史阶段。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在全国政治重心在关中地方确立之后，齐鲁文化的西渐。

齐鲁地区基础深厚的文化，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对周边地区发生重要影响的显著领先的优势。《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秦汉时期，齐

鲁文化在保持自己的个性的同时,又积极参与了“远迩同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会稽刻石)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秦最后灭齐。秦始皇东巡,表现出对包括神祀体系的齐鲁文化传统的某种尊重。齐鲁,作为历史悠远的文化高地,各地人们皆不得不仰视,甚至嬴政这样的强势政治人物也不能例外。秦始皇当政时,据说“天性刚戾自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以其绝对的刚愎自信,却仍然“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在他的高级咨政集团中有许多儒学博士承当政治文化顾问。秦始皇廷前议地方行政格局事,至湘山祠问湘君,海上“求芝奇药仙者”等,都曾经听取他们的意见,“上邹峰山,立石”,又曾经直接“与鲁诸儒生议”。就所谓“坑儒”这一著名冷酷的集体残杀儒学之士的血案看,当时在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诸生皆诵法孔子”者,仅“自除犯禁”而“坑之咸阳”的,竟多达 460 余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刘邦的汉军在歼灭项羽军之后,“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颅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原秦博士,出身于鲁国薛地的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他“征鲁儒生三十余人”西行,合作帮助汉王朝制定朝仪。成功后,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鲁地儒生拜为九卿,使儒学的影响第一次可以托附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空前扩展。

继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之后,西汉政权策划迁徙关东贵族豪杰名家居关中时,首先想到的又是“徙齐诸田”(《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一政策,也许也是齐鲁经学向西部地方传递的一个重要契机。

汉武帝时代,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彻底确定。齐地儒生公孙弘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标志儒学地位开始上升的重要的文化信号。《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以

《春秋》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

陈直先生曾经著文论述西汉时期齐鲁文化人的学术艺术成就,题为《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其中凡举列九种,即:一、田何、伏生等的经学;二、褚少孙的史学;三、东方朔的文学;四、仓公的医学;五、尹都尉的农学;六、徐伯、延年的水利学;七、齐人的《九章算术》;八、宿伯年、霍巨孟的雕绘;九、无名氏之书学。陈直先生主要讨论了齐鲁人以上九种文化贡献,其他“至于《汉书·艺文志》所载师氏的乐学,《律历志》所载即墨徐万且的历学,《曹参传》所载胶西盖公的黄老学,其事实不够具体,故均略而不论”(陈直:《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至182页)。在齐鲁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之中,经学被列为第一,是符合文化史的实际的。

长安因政治重心西移得以吸引齐鲁文化西渐。作为帝国的都城,长安以积极的态度迎接这一历史变化。然而这里并不是儒学向西传布的终点。从儒学向巴蜀和河西等地方普及的文化轨迹看,长安实际上又承担了经学传播的重要的中继站的作用。

二、石渠千秋

汉代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收藏史的新阶段。其重要成就,是经学论著的收藏。而长安,成为经学论著收藏和进一步传播的中心。

在儒学地位空前上升的背景下,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官抄写书籍。按照《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的说法,汉武帝时代,“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七略》说,当时的藏书机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说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等部门的收藏,宫内又有

命名为延阁、广内、秘室的书库。汉成帝时,又进一步访求天下遗书,并指令刘向总校诸书。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儒学经典的不同底本。他宣布自己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以及《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据说都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所得,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且与反对这一主张的博士进行激烈的论辩,于是经学中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唐人崔日知“孔壁采遗篆,周韦考绝编”的诗句(《冬日述怀奉呈兰台诸公》,《石仓历代诗选》卷一一五),又如元人柳贯诗所谓“孔壁发神秘”(《尊经堂诗》,《待制集》卷一),王逢诗所谓“简册潜回孔壁光”(《后无题五首》之五,《梧溪集》卷四),也都是对“孔壁”图书发现的感叹。汉长安城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可以看作这种文献学成就的纪念。

汉代的国家藏书,有了确定的制度,而民间图书收藏也有可观的规模。最典型的例证,也发生在长安。《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病重,汉武帝吩咐臣下:“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者前往司马相如家,“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这里所说的“家无书”“未尝有书”,是指司马相如的论著,而并非图书收藏。《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下·王和平》记载:“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歿,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北海方士王和平由弟子孙邕陪伴前往京师,不幸途中病逝,安葬在东陶。所有图书百余卷,都随葬于墓中。后来听说王和平尸解成仙,孙邕于是悔恨当初不如取其“宝书”以为私有。从王和平出行携带图书多达百余卷,可以推想其收藏文献的数量。这是一个图书随主人向“京师”集聚的故事。这里所说的“京师”,当然是洛阳。但是西汉时期儒生西行长安必然携带常用图书的情景,也是可以由王和平事迹推知的。

三、《法言》“书肆”与“槐市”传说

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强调应当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思想实质，而不仅仅是熟悉和爱好孔子的文字言谈。关于“书肆”，注家解释说：“卖书市肆，不能释义。”涉及到“书肆”的这句话，可能是关于出售书籍的商店的最早的记载。扬雄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是喜欢孔子的书，而不懂得其中的真义，则不过只是陈列和出售书籍的店铺而已。《法言》中所说到的“书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在秦始皇推行焚书之令，制定挟书之律的政策成为历史之后，民间书籍流通显现出新的形势，长安地方专营图书销售的“书肆”已经出现。扬雄是在讨论“仲尼”思想的时候说到“书肆”的，可知在这样的图书传播场地，经学书籍很可能是流通的主体。

记录汉长安城地方风俗制度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说到长安有一处特殊的市场“槐市”。据《艺文类聚》卷三八引文：“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说槐下。”都城中有以槐树为标志的专门设置的空地，国家官学的学生们在月初和月中聚会在这里，以家乡土产以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彼此交换，“相与买卖”。这样定时交易的图书市场，参与流通者是特定的人群。所谓“雍容揖让，论说槐下”，形容了这个特殊的市场的特殊的文化气氛。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学古游槐市”诗句（《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刘宾客文集》外集卷五）。刘禹锡又写道：“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辨鲁鱼。”（《秋萤引》，《刘宾客文集》卷二一）又如宋代诗人葛胜仲诗：“旧直蓬山无俗梦，今官槐市有清阴。”（《近蒙夏蒙夫之文教授用赠太守韵见贻辄复和荅》，《丹阳集》卷二〇）周必大也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见，汉京辟雍载《黄图》，博士直舍三十区，分行数百曰槐市，下有诸生讲唐虞。”（《龙泉李宗儒师儒兄弟槐阴书院》，《文忠集》卷四三）似乎“槐市”的商业色彩较为淡薄，而学术气氛相当浓烈。后来文人们习惯或以“槐市”与“杏坛”并说（如[唐]黄滔《谢

试官》：“得槐市三千，杏坛七十”，《黄御史集》卷七《启》）；[宋]杨亿《景德二年三月试草泽刘牧二道》：“复杏坛槐市之规，遵小成大成之制。”《武夷新集》卷一二；[宋]欧阳修《早赴府学释奠》：“雾中槐市暗，日出杏坛明。”《文忠集》卷五六）或以“槐市”与“兰台”为对（如[宋]苏轼《次韵徐积》：“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东坡全集》卷一五），又有“槐市育才”（[宋]王十朋：《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赐第》，《梅溪后集》卷二）、“槐市育材”（[宋]刘才邵：《贺魏司业启》，《榭溪居士集》卷九《启》）以及“太学曰槐市”（[宋]朱胜非：《绀珠集》卷七）等说法，也体现出这样的认识。“诸生”所经营的“经传书记”，可以明确主要是经学图书。

四、经学研究的中心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儒学被最高执政者重视，其契由正是发生在长安的经学的一次实际应用。据司马迁记述，“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在长安确立最高执政中心的汉王朝努力招致人才。除了吸引各地学者参与议政和行政之外，还殷勤邀请经学专家来到京师。即所谓“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长安于是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

申公曾在长安求学，后来又来到长安。《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写道：“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据《汉

书》卷六《武帝纪》，汉武帝刘彻即位初，建元元年（前 140），“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颜师古注：“以蒲裹轮，取其安也。”《前汉纪》卷一〇的记载是：“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议立明堂。申公年八十余矣。”直接动因似是就经学与行政结合的具体问题请教。经学专家和长安的关系，通过申公的故事可以得到鲜明的体现。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班固称曰：在汉武帝重视儒学文化建设，“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之后，“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这些人物集中于长安，更强化了京师作为经学研究基地的文化影响。

以梁丘贺为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梁丘贺》记载：“年老终官。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孰，专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夫，自有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由此一例，亦可以大致得知长安经学的学术渊源和传递方式。经学名家往往同时又是朝廷大员，经学和行政的关系也因此明朗。

据《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讖、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交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李约瑟说，这是在王莽的倡议下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经学研究人才的集中和经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又达到新的程度。